

新时代下长三角地区 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变动趋势

诸萍^{1, 21}

(1.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

2. 中共嘉兴市委党校, 浙江 嘉兴 314000)

【摘要】:利用原国家卫计委2010年、2015年及2017年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流动人口基本特征、人口迁移距离、迁移方向、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等视角考察了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变动特征。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新增流动人口数量以及农业转移人口数量在不断减少,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呈现年龄结构老化、多民族化趋势;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提高,但仍无法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市场需求;跨省流动仍是最主要的流动模式,人口集聚态势明显,长三角地区已逐渐形成“一核多副”的城市格局;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趋势愈发明显,随迁家属数量增多,家庭结构更为复杂;流动人口就业最为密集的行业是制造业,且职业阶层结构相对固化,职业阶层向上提升相对困难。在此基础上,就当前长三角地区人口流动及管理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长三角 流动人口 变动趋势 人口管理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19)05-0055-10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劳动年龄人口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从农村流向城市。作为新的人口流动中心,^[1]长三角地区人口流动极其活跃且流动人口高度集聚,其人口流动特征与规律具有典型代表性。

按照人口迁移转变理论,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频率,流动者的特征、社会经济结构、流动方向等都会不断变化。当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准确把握长三角地区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最新进展及其态势,是制定该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制度、规划、政策的重要前提。本文基于2010年、2015年及2017年长三角地区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剖析该区域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发生的变动情况,提出对策建议。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开展。为更好地反映出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动态变化,选用了2010年、2015年及2017年3个年份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调查对象都是

¹收稿日期:2019-07-15

作者简介:诸萍(1989—),女,浙江嘉兴人,浙江红船干部学院、中共嘉兴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老龄化、区域经济学等。

网络出版时间:2019-09-10 09:55:18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90909.1656.012.html>

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且非本区(县、市)户籍的流动人口，从中抽取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15周岁及以上、60周岁以下流动人口，其中，2010年共涉及21600个有效样本，2015年共涉及38345个有效样本，2017年共涉及29307个有效样本。

二、研究结果

自201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在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等基本人口特征、人口迁移距离及方向、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均呈现出了若干新特征和新趋势。

(一)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变动情况

1. 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呈老化趋势，且新增流动人口不断减少

表1 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基本特征变化情况 %

年份		2010	2015	2017
年 龄 组	15~19 岁	5.3	4.8	2.9
	20~24 岁	16.3	14.1	11.5
	25~29 岁	18.3	21.3	22.9
	30~34 岁	17.4	16.6	18.4
	35~39 岁	18.4	13.9	14.0
	40~44 岁	14.5	13.6	12.3
	45~49 岁	6.9	9.7	10.6
	50~54 岁	1.9	4.3	5.7
	55~59 岁	1.1	1.7	1.6
居 留 年 限	1 年以内	23.3	22.4	18.4
	1~2 年	27.9	27.8	22.0
	3~5 年	22.0	22.7	20.6
	6~9 年	14.7	14.2	17.9
	10 年及以上	12.1	12.9	21.1
受 教 育 程 度	未上学	2.6	2.4	2.7
	小学	17.9	14.6	13.6
	初中	57.3	52.0	44.9
	高中/中专	17.0	18.5	19.8
	大学专科	3.6	7.5	10.5
	大学本科	1.6	4.6	7.6
	研究生	0.1	0.4	0.9
性 别	男	49.3	52.7	51.7
	女	50.8	47.3	48.3
户 口 性 质	农业	90.2	86.8	80.7
	非农业	9.8	13.2	19.3
民 族	汉族	96.8	95.9	95.0
	少数民族	3.2	4.1	5.0

如表1所示,流动人口中低年龄段人口比重在不断下降。15~19岁年龄组、20~24岁年龄组人口比重分别从2010年的5.3%和16.3%,下降到2017年的2.9%和11.5%。高年龄段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一路攀升。45~49岁、50~54岁、55~59岁年龄段人口比重均有明显上升。25~44岁的青壮年流动人口比重没有较大变化,维持在65%左右。这说明,青壮年仍然是长三角地区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的主力。这与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的特征基本一致。^[2]

从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来看,长期居留流动人口明显上升。其中,在流入地居留时间10年及以上的比重上升最明显,2010—2017年间,比重提高了9个百分点;居留时间在6~9年的比重也有较大提升,由14.7%提高至17.9%;居留时间在1年以内以及1~2年的比重有所下降。这些数据说明,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状态趋于稳定,人口的迁移流动更多呈现为永久性的迁入行为。

结合当前我国总体流动人口规模由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的态势,^[3]可以预见,长三角地区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不断下降,且速度会持续加快。这会加重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程度。在新增流动人口规模减少的背景下,早期的青壮年流动人口随时间推移自身逐渐老化,人口流动家庭化进程中随迁父母等中老年亲属迅速增加,^[4]迁入行为趋于稳定化,这些因素共同影响,将给未来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巨大挑战。

2. 流动人口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地区差异较大且均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如表1所示,流动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占比明显下降,降幅超12个百分点,但初中文化程度仍占主体。小学文化程度的占比降幅也较大,而未上学及高中/中专受教育程度人口比重变化较小。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2017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比为19.1%,7年增加了13.8个百分点。可见,长三角地区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整体素质已有明显提升。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2017年流动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地区差异显著(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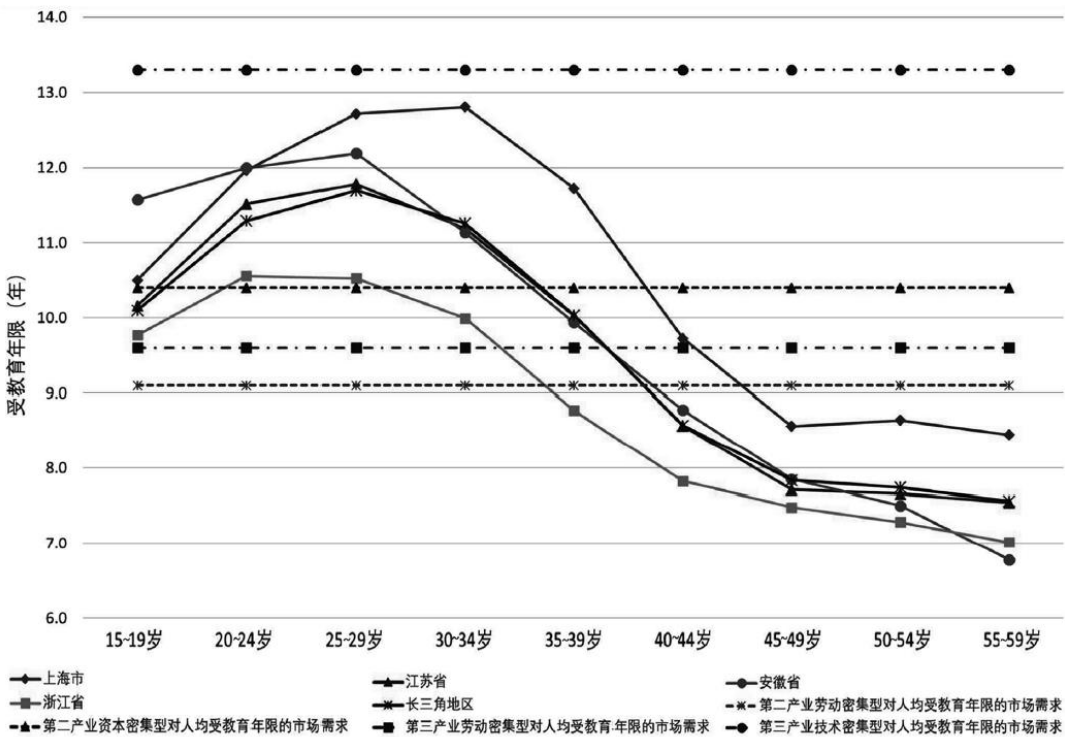


图1 2017年长三角不同省市流动人口分年龄段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市场需求

总体来看,三省一市流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随年龄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各地区受教育年限在不同年龄段存在最高值,且各地区的最高值有较大差异。在绝大多数年龄段上,上海的流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高于其他三省,浙江省在各年龄段上基本处于落后状态。安徽省内流动人口在低年龄段上有着明显的人力资本优势,15~29岁流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长三角地区平均水平,甚至超过了上海。这一现象看似意外,实则合乎情理。安徽省不同于长三角地区其他省市,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省内的人口迁移,其省内迁移比重高达91.3%(见表2),且其中42.5%的人口流向合肥市。由于迁移距离的长短会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在迁入地的就学难易程度,^[5]省内的人口流动相较于远距离的跨省流动而言,其辍学率会低很多,接受教育的成本和机会相对宽松,教育的连续性也会更强。可以预见,安徽省内低年龄段流动人口在受教育年限上的优势,未来必将成为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动力,对整个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表2 2010年、2017年长三角分省市流动人口来源地 %

迁入地	2010年迁出地					小计	2017年迁出地					小计
上海	安徽	江苏	河南	四川	江西	71.5	安徽	江苏	河南	四川	浙江	66.7
	31.8	16.4	11.0	6.5	5.9		29.3	17.2	8.9	6.0	5.4	
江苏	江苏	安徽	河南	四川	山东	80.1	江苏	安徽	河南	四川	山东	78.4
	40.7	25.2	6.4	4.5	3.3		32.9	26.6	9.5	5.4	4.0	
浙江	安徽	浙江	江西	四川	河南	64.6	安徽	浙江	江西	河南	贵州	63.4
	20.7	11.9	11.9	10.2	9.9		19.5	12.4	11.1	10.3	10.1	
安徽	安徽	江苏	浙江	河南	江西	94.8	安徽	河南	浙江	江苏	河北	96.0
	86.9	2.6	2.4	1.8	1.1		91.3	1.3	1.3	1.1	1.0	

尽管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整体素质明显提升,但依然面临巨大挑战。根据已有研究结果,我国第二产业劳动密集型岗位要求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1年,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岗位要求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年,第二产业资本密集型岗位要求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4年,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岗位要求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3年。^[6]从2017年来看,长三角地区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年,该人力资本状况只能满足当前第二产业劳动密集型岗位和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岗位的要求。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时代,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目前,长三角地区仅20~34岁年龄段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可支撑他们转向第二产业资本密集型岗位(见图1),上海市流动人口能较好满足第二产业资本密集型岗位的市场需求,而浙江省内流动人口仅20~29岁勉强能支撑该类型岗位调整。面对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岗位,三省一市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均无法支撑他们转向这些新岗位。由此可见,从供给侧角度来看,长三角地区未来经济发展所遇到的劳动力素质提升的挑战不小。

3. 农业转移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数量逐步减少,且流动人口呈现多民族化

从户口性质来看,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比重加速减少。2010—2015年间,长三角地区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比重在5年内下降了3.4个百分点;2015—2017年下降了6.1个百分点。在2017年的非农业户口中,农民转居民的比重为22.3%。这主要是户籍制度改革所带来的结果。但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落户政策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上海市作为特大城市,实行了最严格的积分落户政策,其他城市次之。这样的落户政策,其结果就是越是级别高的城市,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越强,但入户门槛越高;越是级别低的城市,落户门槛越低,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也偏低。^[7-8]因此,尽管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户口身份导致的等级差异在明显减弱,但户籍制度仍对流动人口的流动产生相当的影响。

除此之外,流动人口的结构变化突出表现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快速发展上。2010年,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少数民族的比重仅占3.2%,2015年上升到4.1%,2017年则达到5.0%,呈现加速的态势。不仅长三角地区如此,从全国范围来看,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的流动规模和流动参与率都处于持续增长中。^[9] 伴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加上少数民族群体自身的特殊性,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面临新的挑战。^[10]

(二) 人口迁移距离及方向的变动情况

1. 省际人口流动模式仍占主导,且安徽省依旧是最大人口输出省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跨省流动人口比重从2010年的64.4%上升至2017年的71.7%。省内流动人口比重稍有下降(见表3)。大规模的省际人口流动正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11] 调查发现,7年中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的来源变化不大。到沪苏浙皖的流动人口(包括跨省流动及省内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安徽、江苏、河南、浙江、江西等邻近省份,来自于中西部人口大省,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5%左右。其中,安徽省稳居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输出大省首位,并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江苏省。

表3 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流动范围、来源及方向变动 %

年份		2010	2015	2017
流动范围	跨省流动	64.4	73.9	71.7
	省内跨市	25.2	17.3	18.2
	市内跨县	10.4	8.8	10.1
流出地/户籍所在地(前六位)		安徽(35.7)	安徽(32.3)	安徽(35.7)
		江苏(18.4)	江苏(14.6)	江苏(13.7)
		河南(7.2)	河南(8.3)	河南(8.3)
		浙江(6.2)	四川(6.3)	浙江(6.3)
		四川(5.9)	江西(5.9)	江西(5.7)
		江西(5.7)	浙江(5.8)	四川(5.4)
流动方向	江苏流动至上海	1.5	3.1	3.9
	浙江流动至上海	0.5	1.0	1.2
	安徽流动至上海	2.9	6.0	6.7
	上海流动至江苏	0.1	0.0	0.1
	浙江流动至江苏	1.2	0.7	0.7
	安徽流动至江苏	9.6	7.9	7.1
	上海流动至浙江	0.0	0.0	0.0
	江苏流动至浙江	1.0	0.9	0.8
	安徽流动至浙江	7.1	6.9	6.6
	上海流动至安徽	0.0	0.0	0.0
	江苏流动至安徽	0.5	0.1	0.2
	浙江流动至安徽	0.4	0.2	0.2
	江苏省内部流动	15.5	10.6	8.8
	浙江省内部流动	4.1	3.9	4.2
	安徽省内部流动	16.1	11.6	15.4
	其他省市流入至苏浙沪皖	39.6	47.2	44.2
总计		100	100	100

分省市来看,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内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外省市,而安徽省内流动人口则主要来自本省(见表2)。其中,上海市和浙江省内流动人口主要来源地均为安徽省,并且上海市对安徽户籍人口的吸引力度强于浙江省,两者分别维持在30%和20%左右。尽管江苏省也是以跨省流动为主,但其省内流动人口比重也较高。安徽省方面,其省内流动人口比重极高,从2010年的86.9%持续提高到2017年的91.3%。

2. 流动方向呈“非对称双向迁移模式”^[1],且“一核多副”城市格局逐渐形成

从长三角内部流动方向来看(见表3),上海一直是人口的净流入城市,流出人口数量屈指可数。流入人口中来自江苏、浙江及安徽省的比重均有明显提高,尤以安徽的比重提高程度最大,在上海外地流动人口中占比也是最大的;江苏、浙江和安徽省内流动人口来自长三角其他省市的比重均有所下降。可见,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尽管各省市彼此间的交流和互动更为密切,但人口迁移的方向却越来越转向核心城市,而并非表现为双向迁移差距的缩小或是对称双向迁移。在京津冀地区,同样也存在着人口向核心城市愈发高度集聚的现象。^[12]并且这种人口集聚态势还会进一步发展。^[13]

就2017年长三角内部人口流动的数据发现,安徽户籍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依次为上海、合肥、南京;江苏户籍流动人口主要流向,依次为上海、南京、无锡;浙江户籍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依次为上海、杭州、宁波,可以说,长三角人口迁移的城市指向性和集聚性非常明显。就流动人口的集聚程度来看(见表4),2017年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中有22.9%集聚在上海,流动人口比重在6%至7%之间的城市有合肥、宁波、苏州、杭州、南京、无锡。特大城市、大城市仍是当下流动人口的主要集聚地。长三角地区已逐渐形成“一个核心、多个副中心”的城市网络格局。该结果同赵落涛等人对长三角地区人口流动所形成的城市网络格局的判断基本一致。^[14]

表4 2017年长三角城市流动人口分布情况

流动人口比重/%	城市
22.9	上海
6~7	合肥、宁波、苏州、杭州、南京、无锡
4~5	温州、金华
2~3	嘉兴、常州、台州、绍兴、芜湖、湖州、阜阳、南通、六安
0~1	滁州、丽水、泰州、铜陵、宣城、安庆、滁州、黄山、扬州、马鞍山、舟山、蚌埠、淮南、连云港、镇江、衢州、池州、亳州、淮安、淮北、宿州、盐城、宿迁

(三) 人口迁移的家庭结构变动情况(见表5)

表5 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流动模式变动 %

流动结构和特征		2010 年	2015 年	2017 年
流动人员的结构	独自流动	27.3	11.7	8.8
	与配偶一同流动	68.2	81.8	83.6
	与子女/媳婿一同流动	43.9	75.1	76.2
	与父母/公婆/岳父母一起流动	4.8	8.8	10.6
	与兄弟姐妹一起流动	1.7	2.5	2.3

流动家庭的特征	与孙辈一起流动	0.8	1.5	1.9
	与(外)祖父母一起流动	0.1	0.1	0.2
	与其他人一起流动	0.5	1.1	3.0
	单个个人流动	27.3	11.7	8.8
	夫妻双方共同流动	25.2	7.3	8.8
	核心家庭	41.2	24.6	22.7
	扩大家庭	6.3	56.4	59.6

1. 流动家庭化趋势更为明显，且已成为主要迁移模式

从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看，“与配偶一同流动”为主要形式，而且该趋势还在强化中。2010年，与配偶一起流动的比例为68.2%，2015年上升到81.8%，2017年上升至83.6%。另外，选择与子女/媳婿一同流动的比重有显著提高，7年间提高了32.3个百分点；选择与父母、公婆、岳父母、兄弟姐妹、孙辈、(外)祖父母等亲属一起流动的比重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选择个体独自流动的比重则持续减少，从2010年的27.3%下降到2017年的8.8%。从个体流动到家庭化流动，对于流动人口来说，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的各项功能，如生育、抚养、赡养、教育、情感、娱乐等，也能更好地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15]这对于流入地城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16]事实上，流动人口家庭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不限于长三角地区，它也出现于京津冀、东北和珠三角等地区，已成为了当前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模式。^[16-18]

2. 流动家庭结构更为复杂，且以扩大家庭流动模式为主

人口迁移呈家庭化趋势的同时，流动家庭内部结构也趋于复杂化。具体来说，流动家庭中仅夫妻双方共同流动的，其比重从2010年的25.2%下降到了2017年的8.8%。由夫妻双方和未成年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比重发生了明显变化，2010年该家庭结构为最主要的流动模式；但到了2015年，已让位于扩大家庭。2017年核心家庭的比重降低至22.7%，而扩大家庭的比重上升至59.6%。除配偶、子女外，其家庭成员还涉及父母、兄弟姐妹、孙辈、(外)祖父母等其他亲属，家庭结构更为复杂化。这一结论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范围人口流动家庭化所处阶段的判断略有差异，即认为当前我国人口流动正处于第二阶段(夫妻双方共同流动)向第三阶段(夫妻和未成年子女共同流动)转化的初期。^[4]事实上，长三角地区的人口流动已经从第三阶段转向第四阶段，即携带其他亲属，尤其是老年祖父母辈随迁流动。这种结果上的差异，恰恰说明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的自然变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即经济发达、人口流动最为密集的长三角地区，在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的自然变化上比其他区域更快。

(四) 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就业结构的变动情况

1. 制造业内流动人口最为密集，且不同地区就业结构开始出现较大分化

在2010年、2015年及2017年，长三角流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均在85%以上。总体来看，长三角地区就业流动人口主要分布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2010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较大，超过了50%；到了2017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口超过第三产业。2010年和2017年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所属行业情况见表6。

表6 2010年和2017年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所属行业情况 %

所属行业	长三角地区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	-------	----	----	----	----

	2010	2017	2010	2017	2010	2017	2010	2017	2010	2017
农林牧渔业	1.2	1.1	0.7	1.6	1.7	1.5	1.2	0.5	0.6	0.8
采矿业	0.2	0.2	0.1	0.0	0.1	0.0	0.1	0.1	0.9	1.4
制造业	38.8	42.2	45.9	39.7	37.9	43.1	50.9	52.0	10.1	22.1
电煤水热生产供应	0.4	0.2	0.2	0.2	0.6	0.2	0.3	0.2	0.7	0.4
建筑	7.5	7.9	10.1	7.8	5.0	9.0	7.1	7.0	13.0	8.1
批发零售	16.3	14.9	11.1	13.4	17.4	14.2	11.0	13.1	29.0	22.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4.4	4.0	4.9	5.5	4.0	3.7	3.0	3.0	7.6	4.4
住宿餐饮	11.9	10.0	8.2	6.9	14.5	10.2	8.5	10.5	15.2	13.1
金融、房地产	0.8	3.8	1.0	5.3	0.9	3.2	0.5	2.0	1.0	6.7
社会服务	8.8	8.2	8.5	8.1	9.3	8.5	7.8	6.9	10.2	10.5
卫生和社会工作	0.6	1.5	0.6	1.7	0.8	1.4	0.3	1.0	0.7	2.4
教育、文体及娱乐	0.6	2.7	1.4	4.2	0.4	2.0	0.4	1.9	1.1	3.3
科研和技术服务	0.9	2.0	2.6	3.4	0.7	1.8	0.7	1.2	1.1	2.3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 和社会组织	0.2	0.9	0.1	1.2	0.2	0.9	0.0	0.4	0.4	1.5
其他	7.3	0.5	4.6	0.9	6.5	0.4	8.4	0.2	8.3	0.4

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就业最为集中的行业为制造业，并且其吸引力持续提高，2010年为38.8%，2017年上升到42.2%。其次是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分别维持在15%和11%左右，近些年略有下降。就业率有明显提高的主要在金融、房地产、教育、文体及娱乐、科研和技术服务等行业，不管是上海、江苏、浙江还是安徽，均有类似发展趋势。

分地区来看，不同省市的就业流动人口所属行业存在显著差异。第一，上海、江苏以及浙江流动人口就业均集中于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内部，而安徽流动人口则主要就业于批发零售业内。第二，不同于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的流动人口，就业于制造业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但安徽制造业就业率相较于其他两省，相对较低。第三，流动人口就业于批发零售业的比重在上海市和浙江省略有上升，而在安徽省和江苏省内有较大下降。第四，流动人口从事农林牧渔类生产工作的比重在各省市均较低，但上海市流动人口从事该行业或职业的比重在上升。总体来看，江苏省和浙江省的流动人口就业分布一致性较高，安徽省还在趋同过程中，而上海市已率先出现制造业内流动人口的转移减少和从事农业生产流动人口中比重提高的现象。

2. 基本形成了“橄榄形”职业阶层结构，但职业等级结构向上提升困难

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社会地位，职业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是不同职业之间在工作性质上的差异，即横向分化；二是职业之间在次序等级上的不平等，即纵向分化。^[19]具体表现为，在职业声望等级排序中，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工作人员、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等的职业声望等级依次递减。^[20]

基于此，分析流动人口职业类型的变动(见图2)可以看到，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基本形成“中间大、两端小”的“橄榄形”职业阶层结构，即职业等级中排名较高及较低的职业所占比重较小，而排名居中的职业所占比重较大。具体而言，2010年，长三角地区就业流动人口中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比重最大，其次是商业/服务业工作人员，两者总计将近80%。2017年，后者比重超过前者，两者总计超过82%；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也相对较大，基本维持在11%左右。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等比重均较小，且后两者有小幅下降。说明近年来长三角地区流

动人口的职业等级结构仅有微弱变化，并未有明显提升。流动人口在职业纵向分化上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非常小，从而导致其在职业选择上的相对集中，且大多处于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的末端。在职业结构分类中，党政官员、企业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才够条件成为中产阶层，而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中的大多数都被排斥在中产阶层之外。^[21]可见，当前长三角地区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的绝大部分人员还不具备成为中产阶层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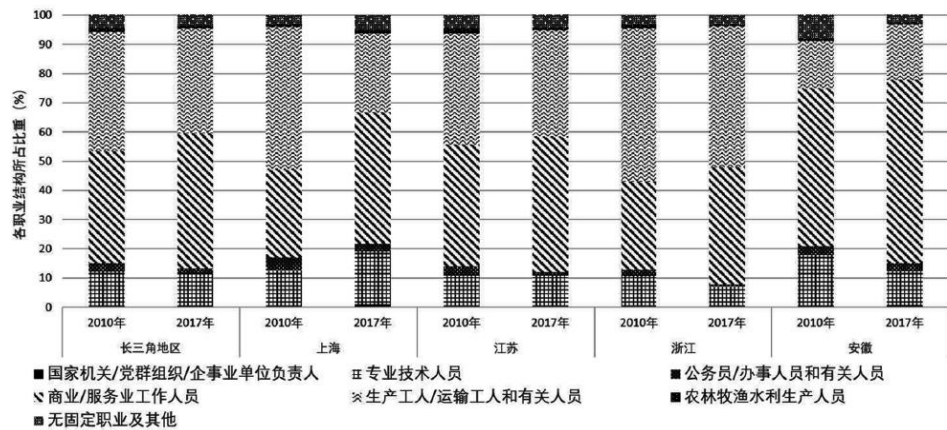


图2 2010年、2017年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职业结构情况

分区域来看，流动人口中从事商业、服务业工作的比重在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均有较大增幅，且安徽省比重最大，浙江省最小。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的比重在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均有所下降，仅安徽省有所提高。但两者总计所占比重在三省一市均在70%以上，均呈现出“橄榄形”职业阶层结构。职业声望等级排名靠前的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在上海市有明显提高，而在江苏省变化不大；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在浙江省和安徽省有所下降。表明，上海市内流动人口职业等级的提升以及中产阶层的壮大比较明显。这也说明，职业纵向分化存在地区差异，在经济社会更发达的地区，人口在职业阶层间的向上流动也相对容易。

三、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从流动人口基本特征、人口迁移距离和方向、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等四个方面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变动情况。

第一，新增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年龄结构上呈现不断老化的趋势，长三角地区将面临常住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挑战。第二，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但仍无法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市场需求，且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第三，农业转移的流动人口比重不断减少但户籍制度的影响依旧显著，且流动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快速上升，给城市民族工作带来挑战。第四，跨省流动仍是当前人口流动最主要的模式，人口向上海市这一核心城市集聚的态势还在加强，大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也相对较强，长三角已逐渐形成了“一核多副”的城市格局。第五，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趋势愈发明显，随迁家属数量增多，尤其是老年祖母辈随迁流动增多，家庭结构更为复杂，长三角地区的人口流动已率先从核心家庭结构转向扩大家庭结构。第六，制造业仍是流动人口就业最为集中的行业，且江苏省和浙江省的流动人口就业分布一致性较高，安徽省还在趋同过程中，而上海市已率先发生了制造业内流动人口的转移减少和从事农业生产流动人口比重提高的现象。第七，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基本形成了“中间大、两端小”的“橄榄形”职业阶层结构，但长三角地区劳动年龄流动人口中的绝大部分人员还不具备成为中产阶层的条件，且流动人口职业阶层结构相对固化，职业阶层向上提升相对困难。

(二) 对策建议

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加快推进的背景下,针对当前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人口迁移流动呈现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人口流动与管理的相关工作也应及时进行调整。

第一,构建面向家庭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养老托幼服务。在制定社会政策的取向上,当地政府应当从关注流动人口个体发展向关注流动人口家庭能力和家庭和谐方向转变,从注重就业和收入等基本经济保障向注重家庭教育、抚养、赡养等保障的方向倾斜。第二,高度关注流动人口新群体,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管理供给能力。由于不同民族在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差异,要求政府部门在服务管理理念和方式方法上做好相应调整。针对长三角地区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现实,要加快推进长三角地区养老产业的合作发展,促进养老产业规模壮大、水平提升,更充分、更均衡地满足广大老年人的多元养老服务需求。第三,地方政府应加快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职业发展体系的建设,及早建立终身学习的教育模式,逐步形成以基础教育为基础、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体的新型教育结构,在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建设中,要推动专业、职业、企业、行业、产业“五业联动”,完善流动人口多元主体职业教育培训机制;要建立长三角地区流动人口大数据库,打通长三角地区人才晋升渠道,完善相关岗位的职业资格认证管理体系。第四,提前做好人口大规模迁移、高频流动趋势出现前的政策准备,助力长三角地区产业纵深布局的形成;考虑到长三角流动人口流动频次高、流动间隔短、定向往返流动等特点,必须加快推进长三角地区在社会服务体系上的衔接,协调建立异地普惠生活体系,提高双城生活群体的生活满意度。

参考文献:

- [1]豆晓,ARELLANO Blanca, ROCA Josep. 基于相互作用关系的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研究[J]. 地理研究, 2018, 37(9):1848-1861.
- [2]陈明星,郭莎莎,陆大道.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特征与格局[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3):363-372.
- [3]郭田勇.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何先增后减[J]. 人民论坛, 2019(5):70-72.
- [4]段成荣,程梦瑶,冯乐安. 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迁移流动议题前瞻[J]. 宁夏社会科学, 2018(2):103-107.
- [5]杨雪,马肖曼. 乡-城新生代流动家庭子女的教育选择研究[J]. 教育与经济, 2016(1):91-96.
- [6]蔡昉. 读懂中国经济:大国拐点与转型路径[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8:144-145.
- [7]李飞武,傅晨. 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意愿及解释——基于广东省珠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农村经济, 2015(5):14-18.
- [8]林李月,朱宇.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J]. 地理学报, 2016, 71(10):1696-1709.
- [9]段成荣. 新时代人口迁移流动趋势及对策建议[N]. 中国人口报, 2018-07-12(003).
- [10]左昕,林李月,朱宇,等.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征现状调查与分析[J]. 广西民族研究, 2019(1):90-99.
- [11]李扬,刘慧,汤青. 1985-201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时空格局特征[J]. 地理研究, 2015, 34(6):1135-1148.

-
- [12]王婧,刘奔腾,李裕瑞.京津冀人口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18,37(9):1802-1817.
- [13]陈蓉.中国人口迁移的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6.
- [14]赵落涛,曹卫东,魏冶,等.泛长三角人口流动网络及其特征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8,27(4):705-714.
- [15]吕青.流动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过程及影响因素——基于江苏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J].人口与社会,2018,34(5):94-101.
- [16]王文刚,孙桂平,张文忠,等.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特征与影响机理[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1):137-145.
- [17]王建顺,林李月,朱宇,等.典型城镇化地区流动人口流动模式转变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为例[J].南方人口,2018,33(6):1-9.
- [18]李吉品,郭晓光.东北跨省流出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学刊,2018,40(2):105-113.
- [19]李路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52-54.
- [20]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J].社会学研究,2005(2):74-102,244.
- [21]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构成及比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3(6):25-32.